



发展传统文化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 陈慧平

尊重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理性选择。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熠熠生辉。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中国的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直到今天，“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富有特色的文化理念依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也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毛泽东在70年前曾指出，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但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是小学生”。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狭隘民族主义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作茧自缚、抱残守缺；民族虚无主义则数典忘祖，对传统文化持抛弃态度，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种种现象表明，正确对待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就无法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使它在新时代获得新发展。

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综合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理解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规律，对传统文化决不

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尤其不能接受任何封建的毒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文化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史的反映。任何文化都有其物质基础，儒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是为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而辩护的，它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一脉相承，与封建等级制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相适应。当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之际，农耕文化因落后而被批判和解构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中国的封建社会较长，封建文化的转化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17世纪即明朝末年开始，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仍然停滞在封建社会中。清朝虽然出现了几个短暂的太平盛世，但这并不能掩盖封建社会的文化日益衰败的总体趋势；清朝末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陷入了总危机。落后就要挨打，不想在落后中沉没，就要在抗争中崛起。伴随着近百年来抗争史、生产社会实践史，中国文化紧紧围绕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这一主题而展开。今

天，中国已经摆脱了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一个强大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站立起来。然而，与经济上的进步相比，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不能令人自豪，传统文化的某些落后方面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下的封建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心理、性格，人格上的圆滑、伪善，社会关系中的“面子”“人情”，价值追求上的官本位、个人崇拜、“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仍然无形地牵绊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不回避、不护短，在反思、清理、批判中不断地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其次，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坚持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新的内容，使之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把变化和运动作为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物质与运动不可分，以物质为基础的文化同样是运动和发展的。文化中的合理内容只能在不间断的实践中保持其生命力，没有不断发展的实践，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后继。事实上，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过程，甚至是“自己反对自己”的运动，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变化，或迟或早，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灭亡。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哪个民族安于现存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不仅不能固守自己的文化，并且最终将导致这种文化传统的瓦解，因为固

守意味着停滞和僵化。今天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还令人心驰神往，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有了生机勃勃的载体，使它发生了一系列变迁，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在理论上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就要引导人们向前看。与倒退地弘扬传统文化不同，前进地弘扬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辩证扬弃，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为坐标，以文化发展的必然性趋势为尺度的创新。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尤其是鲜活的科技实践日新月异的当代，各种与信息时代相契合的新观念大量涌现，为了真正地在文化上实现自信，必须勇于在思想上挣脱狭隘观念的束缚，譬如对文化的基础概念“人”与“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与理解。创新虽然艰难，但却切实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使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文化视野

新型主流媒体新在哪里

□ 王 宁 张恒山

互联网正带来媒体领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不断突破媒体的传统边界。目前，中国网民人数超过了7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最新有关调查显示，“90后”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的比例分别达到20%、50%、80%，而他们平均每天接触手机累计达38小时，新兴媒体正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受到重大挑战。

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创新传播方法手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以多元、立体和丰富的手段，切实提高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主流媒体须强化互联网思维，树立全媒体意识，遵循一体化发展理念，以“最大化的资源节约、最广泛的内容传播、最多元的利益集聚”为追求，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在两端一端渐成主流的情况下，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积极打造融媒体、全媒体，实施跨媒体整合，主动拥抱新媒体，走融合、创新和共赢之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什么是新型主流媒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这是当前对传媒转型的顶层设计，也可以说是传媒转型的最终目标和诉求。

分众化时代的多元传播路径。媒体发展要适应媒介产业发展的消费者变迁背景，其本质是适应媒介分众化趋势。传统观念中利用人口统计特征进行分类已很难把握愈加捉摸不定的受众市场，即使是年龄、教育、收入基本相同的消费阶层内部也可能由于态度观念的不同，呈现出逐步分化离散“碎片化”状态，拥有相似生活形态的受众逐渐重新聚集，最终形成分众群体。分众传播的特点是信息传递多点到多点，体现的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从必须“求同”，到允许“存异”，是社会发展到了阶段以后出现的重大变化。在分众化时代，受众的注意力作为一种不可再生和复制的准天然资源成了市场追逐的对象。新型主流媒体要整合形式多样的媒介形态，并利用这一分众化传播渠道优势，从而实现优化信息、规避信息同质化、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宣传目标。

内容为王下的创新采编流程。面对碎片化、模糊化的受众，媒介融合背景下单一媒体的报道已很难到达目标受众，必须根据不同终端载体的介质差异，将新闻内容生产进行多样化汇聚和组合，使新闻内容整体性、系统性、差异化、个性化融合共生、相辅相成甚至相得益彰。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高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体内容融合发展、驱动媒体内容制作的转型升级。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就是要适应新兴媒体传播特点，加强内容建设，创新采编流程，优化信息服务，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新型主流媒体的评价指标。为新型主流媒体建构起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又能凸显其特性的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结合现有对我国传媒评估的相关研究成果，兼顾我国传媒的双重属性，笔者将新型主流媒体竞争实力评价指标分为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三种类型。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是指其对新闻事件进行建构和传播的能力，它涉及媒体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表征为由媒体自身在发现新闻事件、对新闻事件组织力量进行有效报道以及报道的能力和水平。从整体上看，应将传播力视为传播者对信息进行编码，并以最佳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以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的能力。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主要与机构效能、内容品质和渠道畅通度等三要素密切相关。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是指其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即其赢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的特质和能力。要使公众信赖新型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信息首先需具有较高品质和权威性，同时这些高品质的信息能够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造成影响。新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是指其通过信息传播对受众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程度。影响力是新型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的终极诉求和获得公信力的直接表征。为赢得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就需在赢得信任感、增强吸引力、强化依赖感和提高服务性等方面下功夫。

新型主流媒体怎么建构

从“互联网思维”到“融合思维”：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的方式转变。互联网不只是一个行业，它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支撑社会的全新技术形态。新型主流媒体要适应新兴媒

体平等交流、互动传播的特点，树立用户观念，改变过去媒体单向传播、受众被动接受的方式，注重用户体验，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新型主流媒体应在互联网思维指导下，以服务用户为核心，以开放平台为功能转型，以产品迭代为技术支撑，在坚守主流思想舆论新阵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融合文化”的背景下，仅有“互联网思维”是不够的。互联网只是提供了各种信息呈现的平台和聚合的手段，它要融合的则是各种媒体形式和内容。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融合思维”也非常重要。所谓“融合思维”，指的是基于融合文化的特征，从新旧媒体融通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一种大系统思维方式。融合化的新型媒体平台理念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打破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壁垒，实现不同媒体内容及渠道的融合；二是本着互联网的开放精神，做内容和产品的集成平台，延伸产业链。

从“优势互补”到“一体发展”：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的结构转型。在新的媒介融合生态环境下，只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即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一体化发展，才能形成具有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一体化发展，是媒体融合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方向。现在，传统媒体都在积极发展新媒体业务，办了新闻网站、开了法人微博、建了客户端，实现了互动发展，但传统媒体业务与新媒体业务总体上还是并行的，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树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

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新型主流媒体建构的体制转向。从“融合1.0”到“融合2.0”，就是从媒介融合进化到产业融合，从媒体传播范畴进入产业经济领域。事实上，“互联网+”就是“融合2.0”。对此，我们不仅需要技术应用、内容服务、渠道平台、终端用户等方面的融合，更需要产业融合上的政策支持，这就涉及到政府管理、国家治理和制度创新。媒体产业融合，特别是三网融合，涉及体制机制、利益调整等深层次问题的深刻变革，关系到新型主流媒体核心地位的巩固、国家思想舆论新阵地的坚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媒体融合

文化建設

墨学研究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

□ 王玉堂

战国时期墨子，不仅是一位学显天下的思想巨子，而且是一位“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创立的墨学在先秦时期与儒学一起被当作“显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墨学研究，萃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但墨家思想由于其当时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对现行体制的挑战性而难以被统治阶级所接受，以致秦汉以后几成绝学。墨学研究非但没有像儒学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长期受到排斥。近年来，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要包容，不要专断。《墨子》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由于阅读和研究难度甚大，在不少人看来堪称“天书”。晚清墨学大师孙诒让先生曾言：“盖先秦诸子之伪书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因此，在墨学研究过程中，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见仁见智是正常的，任何轻易地给予肯定或否定，都是不严肃的。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作为研究者，必须要有挑战权威、提出新见的勇气，摘掉有色眼镜，远离无知与浅陋，摒弃傲慢与偏见，不被那些已有的、固化的甚至被当作权威的认知所束缚；以一种开放、求疑、求异的心态面对《墨子》和墨学，你会发现更多真相，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墨子说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諝諝之下。”墨学研究同样也需要“弗弗之臣”和“諝諝之下”。作为墨学的研究者，要有胸怀、有度量，坚持而不固执己见，包容而不排斥异见，尊重而不扼杀新见，真正让“分歧者延延，而支苟者諝諝”，防止“善议障塞”。同时，要从墨学研究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尊重后学，扶植新秀，努力开创墨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要争论，不要争吵。马克思说：“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中国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也说过：“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人们就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是正常的，更是必须的。但争论应该是理性的、有理有据的争辩。长期以来，在墨学研究中，有关墨子里籍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鲁国说、鲁阳说、宋人说、齐人说，甚至还有离奇的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必须承认，一方面，在没有重大考古发现之前，墨子的里籍问题将会一直成谜，任何现有结论都只能是推测和假设；另一方面，任何有关文化名人里籍问题的争论，往往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不应该让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为政府的附庸。墨子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复兴和弘扬墨学，恢复墨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应有地位，让墨家思想和智慧更好地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注重基础研究，更要注重挖掘其当代价值。墨学博大精深，涉猎广泛，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逻辑、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其“兼爱交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强本节用、兴利富民”的经济思想，“非攻善守、常备无患”的军事谋略，“说教行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泥古人、述而且作”的创新精神，“舍身救世、自苦为极”的价值追求，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熠熠生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推崇备至。在加强原典、文本等墨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在实际应用研究上下功夫，注重从多角度、深层次挖掘其当代价值；清代学者偏重校勘、训诂、考据，而忽视对墨家思想学说的诠释、阐发，这是当今墨学研究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要防止为研究而研究的错误倾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上，努力实现墨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提高与普及并重，并把普及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身上，通过领导干部的引领、带动，推动墨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从而成为以文化人的重要思想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推动力。